论中国的人口复兴

穆 光 宗
(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　要: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从增长过快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失衡型人口问题,从体制约束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诱发型人口问题,从多子早子化人口问题转向少子晚子化人口问题。中国早已掉入“低生育陷阱”。持续的低生育和人口衰退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这一新常态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低生育、少子化和高龄化会形成三个恶性循环,即低生育内卷化的惯性循环,年轻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口流失的亏损循环,老年高龄化和人口少子化之间的恶性循环。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优化发展是国家应该肩负起的重大历史责任。人口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和目标,进而提出了人口复兴的主张和建议。

关键词: 低生育陷阱;人口问题转型;人口复兴;人口可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发展
中图分类号:C 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6-0093-07

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中国对人口形势要作出明晰准确、有历史洞察力的评判和预判,否则传统的以数为本的人口治理模式难以与时俱进。国内人口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已经不是总量太大的问题,过低的生育率和失衡的老龄化凸显而出,正持续成为中国人口的新挑战。①本文从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中国人口复兴”的新主张,这是基于人口问题发生重大历史转型的基本事实。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没有能够诠释人口低增长时期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表明,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数量问题的解决,相反地转向了人口结构问题。

一、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重大转型

首先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重大判断,即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强大的限制性生育政策、低迷的生育意愿和高昂的生养成本共同制约下的“晚生少生”成为年轻家庭的普遍行为。②

1980 年 9 月《公开信》发布后,中国就进入了政策性低生育率陷阱,举国追求一孩化的超低生育率,上下一致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20 世纪 90

收稿日期:2016－06－20
作者简介:穆光宗,男,浙江象山县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① 郭志刚指出: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参见郭志刚:《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的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

② 国际上“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 1.5 以下将很难回升。对中国是否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学界有不同看法,参见靳永爱:《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人口研究》2014 年第 1 期)。陈友华认为:低生育水平是“现代性”冲击的必然结果。尽管鼓励生育政策使得一些国家从极低生育水平有所回升,但这种刺激的效应大小与效果持续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刺激生育下的生育率反弹可视为尝试逃出“陷阱”的某种努力,这恰恰验证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合理性。参见陈友华、苗国:《低生育率陷阱:概念、OECD 和“金砖四国”经验与相关问题探讨》(《人口与发展》2015 年第 6 期)。

年代初,我国的 TFR(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开始滑入统计意义上的低生育率陷阱。2000 年五普数据显示,我国 TFR 已经降到令人吃惊的 1.22,即使加上漏报,也不过 1.4,低于 1.5,属于很低的或者超低的生育率。其后 2005 年小普查、2010 年普查数据都显示,超低生育率得到了持续,特别是新生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是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已经转变为“内生性低生育陷阱”。

自从 2000 年中央颁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以来,“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其后一段时间治理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思路。但这一思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以数为本”的局限,与科学发展观崇尚的“以人为本”相悖,而且在我国人口进入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之后,这一传统的治理思路也无法应对人口问题转型的新形势。种种事实表明,我国近年观察到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人口新常态”,不仅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有继续下降的内在趋势。但被庞大的人口总量所迷惑,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口问题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就是从增长过快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失衡型人口问题,从体制约束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诱发型人口问题,从多子早子化人口问题转向少子晚子化人口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TFR)为 1.181,其中城市为 0.8821,乡村为 1.4375,镇为 1.153,属于低于 1.3 的超低生育率。换言之,我国不仅实现了稳定的低生育率,而且早已陷入了不可忍受、风险巨大、危机四伏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难以自拔。

超低生育率和持续少子化所隐伏的风险和代价没有被充分认识,这是令人担忧的。“独子高龄化”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在既定的约束性人口生育政策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选择将使未来人口亏损的趋势继续得到强化。中国需要尽快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部署人口储备的安全战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这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底线。

其次,中国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潜在挑战,面临着人口缩减、人口亏损、人口老弱的巨大风险。高龄少子、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将长时间困扰中国。

劳动适龄人口持续减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15 岁至 59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 9.37 亿人,比上年减少 345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9.2%,比上年年末下降 0.6 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预测,到 2030 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出现大幅下降,平均以每年 760 万人的速度减少。到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从 2030 年的 8.3 亿降到 7 亿左右。①

这一人口变化首先意味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人口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绝对优势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经济增长速度将受到制约。考虑到我国 60 岁退休的制度安排,15—59 岁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有显著的经济影响,将使 2003 年以来持续多年的“劳工荒”问题雪上加霜。因为劳动适龄人口是劳动力人口和实际就业人口的“人口母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道理至简。

需要澄清的是,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劳动人口红利的减少,但不是消失。“劳动适龄人口”不等于“劳动力人口”或“就业人口”,区分这三个概念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解读劳动适龄人口供量减少的经济含义。“劳动适龄人口”包括了一部分残疾失能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则是指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了部分 15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的非劳动适龄人口;“就业人口”则是指在广阔的经济领域实际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实质性的贡献,但其中需要剔除“隐性失业人口”和“隐性无产出人口”,如人浮于事的冗员。

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即人口的贡献和价值。例如,人口增长红利、少儿人口红利、劳动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

①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6 年 7 月 22 日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消息,http://money.163.com/16/0722/12/BSJ0N6EN00252G50.html。

利、残疾人口红利、女性人口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等等,不一而足。人口低负担比所开启的“人口机会视窗”(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不是“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从人口存量来看,2012 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仍然有 9.37 亿,9 亿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的一个人口优势,这也是人口红利的源泉。但这个优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人才的减少而在逐步丧失。

此外,我国 15—59 岁劳动适龄人口绝对量的减少也不是说就过了“刘易斯拐点”。曾经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谈到现代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吸收完毕那个时点到来之后,后人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年轻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中国需要警惕年轻人口亏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6.9%,6 年来首次跌破 7%。周天勇研究发现:20 年前的人口增长与 20 年后的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相关。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22 到 44 岁)萎缩和老龄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口坑”陷阱,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①

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是生育少子化的必然结果,将是一种长期化的趋势。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人口的总量,而是人口的增量,是年轻人口的数量、素质和结构。生育少子化衍生的新增劳动力减量从长期看带来的是弊端。

二、从“如东现象”看中国人口困境

我国的人口态势错综复杂,主要表现为人口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供量连年减少,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加剧,地区之间人口争夺之战悄然打响,失独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国防安全风险接踵而至。

有迹象表明,我国正在一步步陷入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有权利生的不等于有条件生,有能力生的不等于有意愿生,有意愿生的也不等于怀得上生得出。江苏省如东县是观察“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的重要窗口,因为中国人口的转变模式和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同步性,所以如东是值得关注的“知秋一叶”。数据表明,如东已经陷入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老年人口长寿化所引发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陷阱,即“如东现象”。2014 年,如东对全县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 2.8 万多对夫妇进行调查,发现有再生育意愿的占 11.6%。但现实情况却是,从 2014 年 3 月单独二孩实施到 2015 年 10 月,全县共审批单独二孩 193 件,即只有不到 6.9% 的夫妇选择生二胎。如东家庭已经习惯了一家一个孩子的生活方式。如东县人民医院分娩登记数没有什么变化也佐证了“生育反弹特性近乎丧失”“婴儿潮一去不复返”的判断。

长期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计划生育就是一孩化的传统和习惯,已经建立了一种家家户户默然接受的计划生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育和生命。如东的案例启示我们,执行了几十年的生育政策即使一时有所改变(例如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单独二孩政策,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全面二孩政策),也会因为惯性的力量而继续发挥它看不见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显性的力量,独生子女文化是隐性的力量。

概言之,生育政策不仅有生育行为的限制作用,而且有生育观念的涵化作用。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旦独生子女文化主宰了人们的生活,就会自然形成看不见的自觉少生的生育惯性,年轻夫妇在轻松享乐中忘却了生育所具备

① 周天勇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要从中国的人口生育和流动方面去探究。中国长达 35 年之久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使得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加剧,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坑”陷阱;而对人口流动的干预使得中国“青出老回”现象严重,不仅抑制了城市消费,也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参见周天勇:《20 年前的人口增长决定 20 年后的经济增长》,《同舟共进》2016 年第 3 期;《中国经济下行分析的逻辑框架——基于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6 年第 1 期。

的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和社会发展的多重责任,也缺乏规避独生风险的前瞻意识。如东县一样逃脱不了独生子女的风险锁链,有数据称,如东县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父母数量已经达到2700 多人。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限制的是权利和行为,继而改变的是观念和生活,积淀为新的生育文化,强大的文化惯性将使中国在“低生育陷阱”中进一步沦陷。

从 1997 年起至今,如东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必将破坏人口生态,低生育率为源头的人口少子化导致生源减少,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五年前,如东还有 9 所高中,如今只剩 7 所,其中 3 所已经停止招生,并在 2016 年夏天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关闭,为此相关的教职工人口就得被迫下岗和转岗。人口生态概念提醒我们,人口是相互依存的,男女人口,老中青少人口,师生人口,生产型人口、消费型人口和服务型人口等都是相互依赖、互相需要的,一方的亏损会导致另一方的过剩,从而引发人口生态失衡和结构坍塌。

据称,如东实现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 50 万孩子,试想一下,如果这 50 万个生命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如东昔日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真的会受到阻抑或得到推动?① 相反地,对缓解当下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社会活力衰退以及空巢养老困难等问题又会有多大贡献?

因为老年长寿化和人口少子化的双重影响,如东成中国最“老”县城,南通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如东则是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因为年轻人力资源短缺、养老资源匮乏和老年人口长寿化的挤压,如东一线农民高龄化,白头工人增多,同时被迫发展起“老顾老”的照料模式,60 岁上下的人还要工作是因为有父母要赡养照料,但老年型经济和老年型照料终究是难以持续的。按此态势,如东早晚需要引进年轻劳动力来缓解低生育时代所积累的人口亏损问题,但如果如东经济增长乏力,就缺乏吸引新移民的资本和竞争力。放眼全国,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的少子化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所以新移民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如东的人口危机是大国人口困境的缩影,只不过比全国更早爆发程度也更严重而已。可以预见,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将抬高用工成本、进而提高移民人口的竞争强度,低生育、少子化和长寿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将使中国陷入难以名状亦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和人口困境。

低生育、少子化和高龄化会形成三个恶性循环:

其一,低生育内卷化的惯性循环。低生育会成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持续的低生育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惯性。低生育人口、低生育文化和低生育生活构成第一个循环。

其二,年轻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口流失的亏损循环。如东是若干年前的“计生红旗县”,现在的人口结构却满目疮痍,进入为计划生育还债阶段。人口生态严重失衡,年轻人口本来就少,社会缺乏活力,更留不住年轻人,形成低生育为源头的第二恶性循环,即年轻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口流失的循环,形成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惯性。

其三,老年高龄化和人口少子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老年人口的长寿化形成对成年儿女的赡养压力,加上职场压力和生活压力,使得中间一代不敢生不愿生,时间、精力、健康和经济条件都不允许,养老压力超过养老能力必然挤压育幼能力,全社会在高龄化的压力下趋向于生育少子化的选择。

一图解千言。可以形象说明如东养老危机的莫过于 2014 年岁末网络报道上流传的一张著名的四世同代(一般不可能是四世同堂)照片,这是江苏如东县双甸镇星光居委会 19 组的一户人家,典型地展示了少子化背景下倒金字塔形家族人口

① 2016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勇夺冠军,这是 12 年之后重温巅峰时刻。其中女排主攻手朱婷因得分 25 首屈一指而万人瞩目,同时人们注意到朱婷来自河南一个普通的农家,是家里 5 个女孩中的第三个孩子,属于计划生育政策视野中“不该出生”的超生孩子,但朱婷最终成了奥运冠军。朱婷现象不是个别的,超生孩子成为各行精英的例子不胜枚举。朱婷现象人口学意义是证明了超生的孩子不仅有出生的权利,而且和非超生孩子一样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自由平等的出生权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超生社会负担论可以休也。

结构所预示的现实和隐形的双重养老压力。站在照片最前面的是 20 岁的大学生刘心雨,后排左起依次为:45 岁的母亲、91 岁的曾祖母、68 岁的奶奶、66 岁的外公、47 岁的父亲、90 岁的曾祖父、69 岁的爷爷。① 养老压力可以从养老关系和养老责任、养老能力和养老需求的角度来讨论。

首先从养老责任角度看,养老关系连带着养老责任,中国的传统是一代人养一代人,但养老压力会代际传递(一般向下如隔代赡养,个别也可能向上即健康的老人照料低一辈的失能老人)和代内传递(如老助老、同伴抱团养老),孩子近 70 岁的爷爷奶奶在道义上负有照顾 90 岁出头的已坐轮椅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但这要看第二代老人的养老能力和健康状态,否则,第三代人会接过这副担子——实际上是包括养老送终、生活照料、就医护理和精神慰藉四方面的压力,目前养老压力最重的是第三代人,上面有多个老人需要错时照顾,老人在世一天,责任就存在一天。当然,第一代老人的照料可能已经从居家照料转到机构照料,或者第二代老人的养老照料能力足以胜任,这样的话,第三代的养老压力会轻一些。

其次,从养老能力的角度看,自理能力是最重要的自我养老能力,照料能力是最重要的家庭养老能力。贫困、低收入的老年人一旦失能就雪上加霜,自我养老能力完全丧失,完全依靠他人的照料就不幸进入了“辱寿”的困境,所以某些老人的自杀就具有了利他的“合理性”。一般,老人伤残失能与高龄化有关,也可能与摔倒等意外和疾病等伤害有关。从养老能力看养老需求,就不能完全从年龄的角度来划分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一个健康的高龄老人不需要照料,而一个失能的低龄老人反倒需要照料。赡养者和被赡养者的角色是先赋的,提醒的是养老的责任和义务;照料者和被照料者的角色是后赋的,揭示的是养老的能力和需要。赡养者不一定是照料人,被赡养者也不一定是被照料人。养老角色的不同界定和错位现象旨在区分道义上的养老压力和实际中的养老压力,前者源于家庭关系和养老责任,后者关乎养老能力和养老诉求。

目前,如东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 30%,养老压力同时向家庭和社会释放,而且在不断上升。从短期看,留住年轻人口和引进青壮人口是逆转人口萎缩的不二选择;从中长期看,鼓励生育,打造 2—3 孩为主的“合适之家”将有助于改善未来的人口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善长期以来受损的人口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实际上受损的人口结构已经成型因此很难修补,只能在新生的年轻家庭中重建人口结构,继而希望对全社会有所裨益。

如东人口现象提供的是一个教训样本,以严峻的态势告诫世人:首先,人口问题最需要在结构上防微杜渐,一旦进入爆发期,人口危机就会转化成极为复杂的社会危机而难以化解,只能在痛苦中承受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其次,维护人口生态的平衡性、互补性和持续性是国家和地区应该肩负起的人口发展责任,实属百年大计。

三、“人口复兴”任重道远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的世纪。人口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公理性认识是: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人口衰退的能量和惯性,这是民族复兴一个极大的阻碍因素。人口复兴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也是重要目标。

何谓人口复兴? 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鼓励适度生育手段恢复人口的勃勃生机,平衡人口发展的代际代内关系,阻止低生育和少子化背景下年轻人口持续缩减、人口结构老弱不堪的不妙趋势,推进人口年轻化,缓解少子高龄化,促进适度老龄化,优化人口的结构、生态、关系和功能,以实现中华文明的强持续发展。

首先,人口复兴要恢复人口的生机。保护生育的能力和积极性,刺激生育率回升,使得实际的生育率进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这是一个有弹

① “百万人口大县老人占 30% 专家反思‘如东现象’”,大河网—大河报,2014 - 12 - 05,http://focus.21cn.com/society/a/2014/1205/11/28681703.shtml。

性的区间值。目前,国家已经提出“适度低生育水平”的主张。① 那么,如何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 家庭的路径是什么? 国家的路径是什么? 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 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从家庭的角度看,越是接近真实愿望的生育率就越是适度,所以缩小家庭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的反差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可靠路径。根据经验事实,在现有条件下,拥有 2—3 个孩子的家庭越多,所达到的平均生育水平就越是适度。根据家庭内部的条件和能力理性做出选择的生育率是适度的,因为这是贴近千家万户生活实际的生育率,是符合“家庭计划”的生育率。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较大,所以尽量避免一孩化选择,让“非一孩化”成为大众化选择这是符合绝大多数家庭利益的适度生育战略。

从国家的角度看,则要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就是总和生育率要落在 1.8—2.5 之间,围绕更替水平生育率上下波动,而且越是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在理论上就越是能够接近适度低生育率,也就越能保障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其次,人口复兴要保护人口的生态。就是要处理好亚人口或者说分人口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亚人口之间的关系是狭义的人口生态。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广义的人口生态。

人口与资源环境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非常复杂。人口有两个“面孔”,一个是数字人口,核心是“口”,但数字是人口的表象特征,容易使我们陷入“人数同质性”的认识误区,人数展示的是乘数效应、除数效应、增量效应和减量效应;另一个是生命人口,核心是“人”,是人的素质、结构、行为和生存方式,人口作为个体生命的集合具有能动性和适应性,人口作为“人类”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这表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动态的。

解决“人口资源问题”“人口环境问题”已经不能依靠传统的出生控制,资源是流动的而环境是固定的,情形有别,关键要摆脱贫困,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要规范损害环境的人口行为,调节压迫环境的人口数量(要区分存量问题还是流量问题)。资源环境系统能够养活多少人口不仅看自然的产出,而且看社会的产出。

再次,人口复兴要保障人口的生活。人口复兴的家庭政策是:发展和强大“健康家庭”和“优质家庭”,控制和减少“风险家庭”和“脆弱家庭”,帮扶和关怀“残缺家庭”和“困难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需要强健的家庭细胞。于国于家,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都是万古不易之真理。

四、提高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应对

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龄化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重大国家危难”。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已经有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前车之鉴。人口国难、人口坍塌、人口噩梦等新词的出现并非危言耸听。2016 年年初统计,日本 14 岁以下少儿人口比例为 12.82%,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 26.59%,少子化和老龄化同时加剧,如果出生率无法提升,2060 年的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 40%。2000 年开始,俄罗斯逐步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但似乎无法逆转人口萎缩的态势。2014 年韩国预测,如果总和生育率维系在 1.19 的超低水平,那么到 2750 年韩国人口将自然消亡。韩国政府为提高生育率而实行生育津贴等多种生育奖励政策,但同样难以取得预期成果。如果一直维持 1.2 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人均寿命不变,那么总人口将以每 25—30 年(相当于一代人)减少 45% 递减(1—1.2/2.2),这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口大国也不例外。2020 年前后,全球人口或将迎来人口衰退的另一“转折点”,全球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 5 岁以下孩子数量。年轻人口所承受的发展经济的压力和赡养老人的压力将不堪重负。

相比于人口小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中国人口问题容易被数量化、规模

① 笔者 2010 年 5 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经撰文提出要实现适度低生育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观点。

化和表面化,从而遮蔽了深层次的人口问题。提振超低生育率可以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和历史使命。超低生育率的危害很深,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口的弱持续发展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存在着内在的力量和机制,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关键点在于人们关于婚姻—生育—家庭的价值观念,在于人口发展的“文化自觉”。历史不能重演,但未来可以重建。为了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需要重建优化人口发展的社会价值体系、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以人口强持续发展为目标,预防人口发展风险,统筹应对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危机。

首先,重建生育文化。“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是值得尊崇的核心价值观。“结婚生子”不仅是人生使命,也是公民责任。年轻人口是未来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军,为此需要重建生育的责任伦理。自由自主的生育权是天赋人权、基本人权,这是古今共识。加强新人口危机教育,塑造和传播正确的人口价值观,积极寻求提升生育率的文化动力。

其次,重构人口国策。“鼓励二孩、多孩不限、保障优生”应该成为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人口新政的基石。降低和控制生殖系统疾病,减少人工流产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破坏,促进两性生殖健康。用“优化生育”替代“计划生育”,倡导适龄、适时、适量的生育。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防患于未然。人口代际平衡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年轻人口的萎缩和人口结构的畸变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替代和改变。在源头上,作为治本之策,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通过提振生育率和人口引进的“适度老龄化”战略来应对,人口亏损需要人口储备和人力补充来平衡和应对。

再次,重筑保障制度。组合提升生育率的制度力量。超低生育率是现代性的产物,是高抚育成本约束的结果,需要通过家庭友好、生育友好、孩子友好的社会政策和保障制度,实现生育部分成本外部化、孩子抚育功能社会化。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同时提升生育的效用,刺激已婚人口的生育积极性,确保家庭的养育能力。

国家层面对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新人口危机要早日达成共识,同时要有社会政策和国民行动的配合和落实,即政府提振生育率、保障优生率的措施能够带动积极的社会响应。人口和生育关乎国家命运和文明兴衰,人口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历史工程。

Population Rejuvenation in China

Mu Guangz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low fertility rate does not mean the eradication of demographic threats in China, but indicates the 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challenges. Demographic concerns have shifted from overpopulation to population imbalance, from institution-constrained issues to policy-induced issues, from high birthrates and early childbearing to fewer births and delayed childbearing. China has long been stuck in the low-fertility trap. Continued low fertility and demographic decline have constituted China's new demographic realities, threatening to undermine China's rejuvenation. The plunging fertility rate,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advanced ageing will create three vicious circles, including a self-reinforcing fertility decline, a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declines and outflows of young population, and a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accompanied by a falling birth rate. New population challenges require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to ensure demographic sustainability and realize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Population rejuvenation is critical to China's rejuvenation, and constitutes a core objective o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bout population rejuven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ow-fertility trap, population transition, population rejuvenation, demographic sustainability, population optimization